

三星堆遺址發掘引發之「猜想」與期盼

嚴謹的考古學家堅持有一分物證說一分話，這是正確的，但考古只是在證明歷史，在證明考古點中所生成的「點性歷史」，點性歷史只有發展成線性歷史，才是一部經得起挑剔的歷史。不久前媒體披露經科學手段測試，是次三星堆遺址考古出土物的斷代在商代晚期，對此一些粗心之人或許會以為三星堆文明是距今3100年左右的一支華夏文明，或是認為中國文明起始於商代，筆者將在今期文章中結合拙作《祖源記憶》放大一些三星堆考古的細節之處。

文：楊永年



三星堆遺址出土之金面具



民間收藏的古蜀玉器頭像面具



民間收藏的古蜀玉器面具

線性歷史的建立是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共同努力，考古的完成既要有田野考古又要有社會考古。歷史的敘說，既要有邏輯思維，還得有形象思維。李濟先生說得好：「要預備寫一部中國上古史，我們不僅需要科學家，也需要文學家。不僅要參照鐵的事實，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。」

筆者在拙作《祖源記憶》書中（四川文藝出版社，2018）曾指出，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，是炎帝族群培植的紅山文化，經過民族大遷徙，血源大混化，祖源大整合，文化大融匯，在距今4800年左右，先後在古蜀上演的炎帝文化的最後輝煌。是與黃河文明並駕齊驅的長江文明的源頭之一，或許是最重要的源頭。這次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出土，我以為對拙作中提出的系列「猜想」從某種方面也提供了一些驗證的思路。

古蜀「坑」中多跽坐人像

炎帝族群的祖先崇拜是偶像崇拜，筆者猜想其啟始是紅山先民對「龍」的具像創作。那時的中國龍是「神格祖先」，在炎黃大戰、炎帝族群敗走四方成為四夷的時空中，「龍的傳人」意識出現了。到了良渚文化期，對「蠶（蟬）從」「脫變」認知成熟了。「龍的傳人」由意識昇華為「文化」。到古蜀地，「龍」在堅守「縱目」這個基本造型元素的前提下，完成了從「神格化」到「人格化」的進化，產生了在中國遠古史中，古蜀獨有的「面具文化」。而在黃帝族群建立的黃河文明中，祖先崇拜是以「方向」「方位」為指向的，這在古籍中是有多處記載的，所以至今在中原文化中不見面具文化。

古蜀與中原在祭祀中，除了上述的對象不同外，在祭祀的形式和手段也各有其異。古蜀以玉器、青銅器，應該也有石器和陶器構建多種藝術形象，比如祖先的全身像和人面像；比如字紋，眼紋，牙璋上的山川，巫師持有的手勢等等，表達古蜀地在社會生活中，先祖與世人的友好往來以及和諧關係，是在一種意識的親情感召下形成的政治，或許這也是至今在三星堆出土物中未曾發現兵器的一個原因。中原的祭祀着眼於「過程」，讓參與者在過程中形成行為的模範，促進統治者秩序的建樹。這個過程以單一的青銅禮器呈送犧牲去賄賂神靈，甚至不惜殺人。是在物質的基礎上形成意識。所以中原的「坑」中多白骨，古蜀的「坑」中是跽坐人像，這樣的跪姿跽坐，源自紅山文化。不僅有考古發掘物，也有學者研究的源流過程。

為什麼在上次的發掘和這次發掘出土物中沒有見到大量的玉（石）跽坐

像呢？筆者猜想是因為古蜀的祭祀有着強烈的「教化」功利，這種教化是在多層面上進行的，有集中的「大祀」，還有分散的「群祀」。或許青銅大像就在三星堆這類的「大祀」中出現，玉（石）小件則散在眾多的「群祀」中。所以現今在民間有許多所謂的「三星堆玉器」存在，筆者期待這次和今後的考古中發掘出玉（石）的跽坐人像，去解除民間收藏的心結。

筆者是抱有信心的，因為紅山文化始終都是在用玉器去承載去解說的，三星堆文明在1929年的初次發現時就幾乎全部是玉、石器，35年前的三星堆成規模發掘，玉石和作坊也是主角之一。

出土的「龍」和「鳥」

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歷史學家的研究指出，華夏先民的部落也是由兩個「半部落」組成。筆者在拙作《祖源記憶》中猜想，炎帝部落也是由將祖源指向「龍」的「半部落」，和將祖源指向為「鴉鳥」的另一個「半部落」組成。所以在紅山文化的考古出土中有「龍」，有「鴉」。在已驗證的後來的民族遷徙線中，都有「龍」和「鳥」的作品出現。

前次的三星堆發掘也是出土了多件的「龍」和「鳥」。文獻講古蜀分蠶叢、白灌、魚鳧、杜宇、開明五大時段。筆者以為「蠶叢」是將祖源指向「龍」。古籍說「蠶叢縱目王瞿上」。筆者在《祖源記憶》書中的解讀是，「蠶叢」不是名詞，是形容詞，指出第一代蜀王是像蠶（蟬）脫一樣，從縱目的紅山龍重生而來。「瞿上」是指第一個蜀王在「瞿」這個地方形成。饒宗頤先生更是從甲骨文的構成上去解讀「瞿」，指出「瞿」是縱目之人。這或許是強調在古蜀，「龍」已由「神格化」變成了「人格化」。而蠶叢後面的白灌、魚鳧、杜宇都是在將祖源指向為「鳥」。這樣的指認除了有古籍、有傳說，更有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多件鳥紋為證。期待這次的發掘，出現更多物證。

基於上述，我在拙作《祖源記憶》中猜想，在古蜀除了已明確的有龍紋背景、可能是將祖源指向為「龍」的青銅大立人外，還應該有一個與鳥紋、雲紋為背景，可能是將祖源指向為「鳥」的青銅大立人的存在，或許它已經出土了，只是沒被認出，當然這一點尚需進一步的考證。

當下正進行的三星堆遺址的六大「坑」發掘，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出土物和緊跟的學術解讀去驗證上述猜想，相信這樣的期盼不止筆者一人。

楊永年著《祖源記憶》



民間收藏的跽坐古玉（石）猴形雕像



三星堆遺址出土之青銅鳥



民間收藏的跽坐古玉（石）雕像



民間收藏的玉（石）雕鳥紋



民間收藏的將祖源指向為「鳥」的玉（石）雕像



三星堆遺址「再驚天下」現已出土重要文物500餘件，這是在三星堆博物館拍攝的「青銅大立人」。新華社



銅戴冠縱面具



元青花龍紋高足杯



元青花神人仙鹿圖玉壺春瓶

恒雅藏珍

作者：香港中華藝術文化推廣基金會主席 李秀恒

造型百變的元青花

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外族大一統朝代。從草原上來的「馬背民族」，為中原地區帶來了他們的獨特文化，亦影響到元代瓷器的造型特徵。元代瓷器作推陳出新，匠心獨運，巧思滿溢，創意無限。

蒙元嗜酒，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酒文化，而酒器亦多有講究。元代的一幅《蒲城墓葬壁畫》，就向我們展示了元朝的酒器。例如圖中左側桌上造型優美、被譽為「瓶中三寶」之一的玉壺春瓶（造型請參閱元青花神人仙鹿圖玉壺春瓶），在宋元時期常用作盛酒器皿，到明清時期才漸漸演變為陳設瓷。

再如玉壺春瓶旁的有嘴摺盃，此種器皿被稱為「匱」（造型請參閱元青花束蓮紋匱）。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後，景德鎮根據蒙古族所使用的金屬器具造型燒造了大批陶瓷，當中就包括匱。因用玉壺春瓶直接往酒盃中斟酒不方便，較難控制，因此會先將美酒傾倒在匱中，再分至杯中。匱的流口之下的圓環，就曾被騎馬者用穿帶繫在腰間，以便使用。

而在元代盛行的高足杯，亦是酒器之一。蒙族人為了可以在馬背上能豪邁地暢飲，十分鍾情此種便於抓握的酒杯，修長的把柄方便繫於腰上或掛在馬背上，因此亦被稱為「馬上杯」。

除了酒器之外，十分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青花盤，尤其是菱口造型，皆乃藝匠以意繪飾，舉世無雙，因工序繁複、用料不菲，產量稀少，後逐步簡化為圓形。因此菱口式元青花盤，往往價格不菲，2016年，香港蘇富比一件元青花蕉葉秀石印花纏枝牡丹紋菱口式大盤，便以2988萬港元高價成交。

元青花除了基本造型器皿，如瓶罐、碗盤、杯盃、盆盃、壺、匱、盒等，更有一些用途尚未確證的特殊器型，例如外形似蒙古包的器皿、球形器皿等，大型器具恢弘霸氣，小巧之物秀美精緻，共同向世人呈現元青花別具一格的美學理念。



元青花束蓮紋匱



元青花雲鳳紋菱口盤



元代《蒲城墓葬壁畫》